



总第一期

一九八六年创刊

古籍整理与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办



古籍整理与研究

周谷城题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籍整理与研究》

古籍整理与研究

1986年创刊

(总第一期)

《古籍整理与研究》编辑部编辑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办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北京市期刊登记证第1393号 定价: 1.50元

全國高等藝術古籍整理工程委員會主任

本刊顧問

白壽彝 鄧廣銘 周祖謨

主 編

孫欽善

副 主 編

嚴紹璽 安平秋

編 委

(以姓氏筆畫為序。有*號者為常務編委。)

*馬樟根	劉茂烈	*安平秋
*孫欽善	嚴紹璽	吳 楓
沈錫麟	金開誠	宗福邦
黃永年	章培恒	曾枣庄
裘錫圭		

上海古籍出版社

整理古籍是為了繼承中國
文化遺產

祝賀《古籍整理與研究》創刊

王力



1984.9.20.



编 者 的 话

《古籍整理与研究》是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办的学术刊物。其宗旨是反映以高等院校为主的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成果，总结前人治学经验，倡导科学的精神，谨严的学风，求实的态度，以推动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

《古籍整理与研究》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不同学派、不同见解之间互相讨论，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注重有创见的文稿，充分尊重老一辈学者的著作，积极向社会推荐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

《古籍整理与研究》刊登下列范围的文稿：

- 古籍的整理与研究；
- 古籍整理史研究；
- 中国文化史中有关问题的研究；
- 国外汉学及中国学(Sinology)的研究；
- 古籍整理方法论及手段现代化的研究；
- 古籍整理研究成果的介绍与评论；
- 古籍整理的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的研究；
- 有关教材编写工作的讨论和优秀教材的选登与评介；
- 学术动态与出版消息；
- 有关资料及知识。

《古籍整理与研究》暂定为每年两期，每期25—30万字，十六开本。

《古籍整理与研究》将努力办成高校和社会各有关单位的古籍整理研究、教学、出版工作者切磋学问，探讨问题的园地，竭诚欢迎大家踊跃撰稿。论文、札记、资料、评述均所欢迎。来稿请用新式标点，简体、横书，正楷誊清，挂号寄至北京大学五院古文献研究所转《古籍整理与研究》编辑部。

古籍整理与研究

(总第一期)

一九八六年

创刊

目 录

- 王力先生题辞.....(1)
编者的话.....(2)

笔谈古籍整理研究

- 整理古籍也要走现代化的道路.....(任继愈) (1)
应注意对流失在国外的我国古籍进行调查了解.....(汤一介) (3)
几点务虚的意见.....(吴小如) (5)
浅谈图书馆的古籍整理工作.....(姚伯岳) (6)

古代典籍研究

- 《楚辞》二题.....(金开诚) (8)
试论《建康实录》的文献价值.....(张忱石) (15)
释敦煌写本王道祭杨筠文
——兼论有关王梵志的考证.....(黄永年) (25)
《宋宰辅编年录》考述.....(王瑞来) (31)
《通典·食货志》所引史料辑评.....(曾贻芬) (46)
三苏后代考略.....(曾枣庄) (57)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略论.....(吴树平) (73)
《万木草堂口说》整理杂谈.....(楼宇烈) (91)

古籍整理方法论研究

- 训诂学与古籍整理.....(关步勋) (100)
略谈清代文史考据之学在思想方法上的缺陷.....(葛兆光) (105)
注释·译文·词典
——杨伯峻先生古籍整理方法试析.....(李解民) (110)

文献学史研究

- 我国古文献学的开拓者——孔子.....(孙钦善) (117)

宋代诗经学概论.....(冯宝志)(128)

国际汉学研究

日本手抄室生寺本《本朝见在书目录》考略.....(严绍璎)(146)

《俄国中国学史略》内容译介.....(姜筱绿)(164)

读书札记

《陈书》札记.....(王岳全)(176)

《隋书·经籍志》标点勘误.....(李庆)(190)

《全金元词》中一些问题的商榷.....(么书仪)(196)

《章太炎全集》第一册标点商兑.....(周大璞)(203)

(1).....(王岳全)

(2).....(李庆)

读《史记》札记

(1).....(王岳全)

(2).....(李庆)

(3).....(么书仪)

(4).....(周大璞)

读《汉书》札记

(5).....(王岳全)

(6).....(李庆)

(7).....(么书仪)

(8).....(周大璞)

(9).....(王岳全)

(10).....(李庆)

(11).....(么书仪)

(12).....(周大璞)

(13).....(王岳全)

(14).....(李庆)

读《三国志》札记

(15).....(王岳全)

(16).....(李庆)

(17).....(么书仪)

(18).....(周大璞)

读《晋书》札记

(19).....(王岳全)

整理古籍也要走现代化的道路

任继愈

整理古籍，我国自乾嘉以来就有优良传统，当时大量有关古籍整理的成果，有的已被国内外学者所公认，有些结论已可视为定论。

乾嘉学者，处在封建专制主义占绝对统治的时期，客观上不允许他们对君父不敬的言行，著作中当然要有所顾忌。当时学者们主观上也不能不带有几千年长期封建传统教育的烙印，思想还不解放。从整理经史子集的成绩来看，关于史、子、集方面的成绩较多，而对“经”的整理成绩，相对来说少些。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对圣贤经传不敢怀疑，从思想上就不敢放言高论。

就取材印证方面说，古人的眼界也还不够开阔，眼光多盯着古代典籍。典籍以外，如地下考古实物，如民间社会习惯，中原地区以外的兄弟民族文化(包括民族学、原始宗教、民族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没有涉及。当时的学者精通本国语文，而不通晓外国语文，或精通汉语，而不通晓其他兄弟民族语言。这也给他们的成就带来了局限。近代西方汉学者如高本汉、伯希和等人，整理中国古籍有所创获，不是他们读古书比乾嘉学者多，而在于他们有比乾嘉学者多一些的工具。当然，他们也只是在某一方面有所前进。

语言工具只是工具的一种。此外，还有整理古籍现代工具，象近十几年被普遍重视的计算机，西方已经用到古籍整理方面，编制索引分类，已取得可观的成效。

此外，乾嘉学者以及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不具备的，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有了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使人们心开目明，取得高

屋建筑之势，进退自如。这一方面，理论界、史学界早已注意，在整理古籍方面似当须更多地引起重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不难懂，难的是把他运用到古籍整理的具体工作中去，而不是生搬硬套。不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就谈不到现代化。这要靠大家共同努力才行。

学问的发展趋势，今天大家看到的，有两个方向，一是向深度发展，一个部门学科的一个分支的一个局部的专题，在很狭窄的范围内越挖越深；二是学科之间要求开展横向的联系，一门学科解决不了，要众多学科的配合。比如整理古籍中的天文志、地理志，光靠古人的研究成果已不够，还要结合现代的天文学的推算，来加以验证；讲古代的地理，四夷的交往，要结合现代的地理研究成果，结合世界史，就更能说明问题。利用地下的发掘的古文物可以充实古籍中记载的不足。如秦始皇陵的车马坑的实物，可以明确无误地说明古书上的车制。参考我国少数民族流行的对歌及春游习俗，有助于对《诗经》、《国风》的理解等等。

再如整理古籍，古人受正统儒教的影响，对经史子集以外的佛、道两教，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佛、道两教遗留下来的古籍很多，却没有人对此很好地整理，更说不上很好地利用其中的有用资料了。其实，佛教及道教典籍今天已不能用过去的旧眼光对待，把他们排斥在中华民族正统文化之外，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个部门。搞不清楚佛、道两教的文化，也就无法全面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随着《中华大藏经》

(汉文部分)的整理出版,我们将逐步建立起“佛典文献学”,这将成为一个新的分支学科。世界宗教研究所今年将在这一方面招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这也是古籍整理工作中待开辟的一块生荒地。道教古籍的研究也刚开始,因为道教内容比佛教更芜杂,有了文、史、哲的知识还不够,还得运用化学、生物、医学等现代自然学的知识和测试手段。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也开始注意,并已起步。

总之,整理古籍,也要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乾嘉学者的好传统,我们要继承,同时要提高、前进,超过他们。既然要现代化,整理古籍除了文、史、哲等传统文化知识外,还要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如上述的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自然科学等等。表达方式也要相应地作些改变。乾嘉以来相延已久的整理古籍的术语已感不够,需要增加新的术语和表达方法。有时要有百分比符号(%)、现代数学公式、化学方程式,有的需要用图表、图片、或绘图来表示。光靠语言文字,已不能满足需要。这是后话,暂时可以不讲。

乾嘉以来相延已久的整理古籍的术语已感不够,需要增加新的术语和表达方法。有时要有百分比符号(%)、现代数学公式、化学方程式,有的需要用图表、图片、或绘图来表示。光靠语言文字,已不能满足需要。这是后话,暂时可以不讲。

乾嘉以来相延已久的整理古籍的术语已感不够,需要增加新的术语和表达方法。有时要有百分比符号(%)、现代数学公式、化学方程式,有的需要用图表、图片、或绘图来表示。光靠语言文字,已不能满足需要。这是后话,暂时可以不讲。

乾嘉以来相延已久的整理古籍的术语已感不够,需要增加新的术语和表达方法。有时要有百分比符号(%)、现代数学公式、化学方程式,有的需要用图表、图片、或绘图来表示。光靠语言文字,已不能满足需要。这是后话,暂时可以不讲。

乾嘉以来相延已久的整理古籍的术语已感不够,需要增加新的术语和表达方法。有时要有百分比符号(%)、现代数学公式、化学方程式,有的需要用图表、图片、或绘图来表示。光靠语言文字,已不能满足需要。这是后话,暂时可以不讲。

乾嘉以来相延已久的整理古籍的术语已感不够,需要增加新的术语和表达方法。有时要有百分比符号(%)、现代数学公式、化学方程式,有的需要用图表、图片、或绘图来表示。光靠语言文字,已不能满足需要。这是后话,暂时可以不讲。

应注意对流失在国外的我国古籍 进行调查了解

汤 一 介

我国的古籍现存到底有多少说法不一，无论说是八万种或十万种，对我们来说，一是如何利用，以研究和发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二是如何保存，以便后代人仍可利用。但是利用古书对古代文化进行研究总是第一位的，因此保管古籍的制度应该是便于人们来利用它进行研究。不过有些古书确实宝贵，如果利用不当而受损失，将不利于别人进行研究，所以整理和印行古书就是一件十分迫切的任务。现在看来，在对古书的利用和保存上都存在不少问题，急待改进，这方面的问题许多学者都提出过不少宝贵意见，总希望能早日妥善解决。我曾在美国参观和利用了几个大学的图书馆，觉得有些制度和作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在美国所去的大学，他们的善本书库一般都是对学者开放的，可以让我们随便阅览。正因为如此，我才能较大量地直接看到一些在国内很难看到的书。由于我不是研究版本和目录学的，因此我不敢说我在国外看到的一些书在国内到底有没有，但我直接在书库中翻阅这些书，对我们的研究确实是有意义的。如果有些书在国内确实没有，我们就应设法把这些书影印回来，以便国内学者利用。对这个问题我想举点例子来说明。

在参观普林斯顿大学的葛斯德东方图书馆(Gest oriental lebaray)的中文善本室时，我看到一部《磻砂藏》，出于好奇，我把它和我国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磻砂藏》比较了一下，发现第一卷(即“天一”)的“音释”不同，这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我能去普林斯顿的时

间很短，对这部《磻砂藏》(下简称“葛斯德藏本”)只用了一天半时间翻阅了若干卷，看来这种藏本可以补充商务影印本之处很多。据该馆统计，葛斯德藏本中有宋原刻本约七百册，元原刻本约一千六百册，余为配补明南藏本或天龙山本约八百余册，又有明万历间白纸精钞补本约二千一百余册，总计五千三百五十九册。另外在哈佛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也分别藏有若干卷《磻砂藏》。胡适在一九五五年曾对葛斯德藏本进行过研究，发现商务影印本所缺部分，而在葛斯德藏本中不缺。在《胡适手稿》第八集卷三中说：“一个最有兴趣的发现就是证实了那半部(指葛斯德藏本中的半部)二千三百多卷宋刻和元刻的藏经确是磻砂延圣院的大藏原本。”又说：“里面的二千一百多卷白纸补本都是依据磻砂藏原刻本精钞的，补钞的年月都在万历(1600)年左右”。

在普林斯顿大学一天半的时间中，我把最早有明确刻板年代的葛斯德藏本和商务影印本对照起来看。葛斯德藏本中最早的刻板有明确年代的是“释”字画，其中第七卷为《法海经》、《海八德经》和《四十二章经》三经同卷，本卷末题有“皇宋绍定五年(1232)正月□日苏州陈湖心磻砂延圣院干雕大藏经板沙门善成……同募”云云，此卷显然是宋原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则是用“思该藏”补的。对比之下，可以看到葛斯德藏本很有特点，它的《四十二章经》题为“大宋真宗皇帝御制”，后并附有“大唐太宗皇帝题焚经台诗”一首，还有一条长达五百五十余字的附注，这些都

是补本“思该藏”没有的。现把所谓“唐太宗诗”抄在下面：

门径萧萧长绿苔，一回登此一徘徊，
青牛漫说函关去，白马寺从印土来。确定是非凭烈焰，要分真伪筑高台，春风也解嫌狼藉，吹尽道教当年灰。

这首诗当然不可能是唐太宗作的，这且不去管它。附注五百五十余字是说“永平求法”的故事，也没有什么史料价值，这里就不抄录了。但这些材料却也表现了南宋刻经时的一些情况。还有可以注意的是，葛斯德藏本《四十二章经》后面的“释音”很详尽，很可用作参考，如“四耨”一条的“释音”如下：

“内沃反，雪山之顶有阿耨达池，而四河出焉，故言四耨。水池之东派曰殒伽河，此云天堂来，以从高顶而下，状若天来也。池之南派徙信度河，此云验河。池之西派曰徙多河，此云冷河。池之北派曰缚刍河，此云青河，流及此土名黄河也，如涂足油者言其少也。”（慧琳《音义》无此条）

这类“释音”也许多无用处，但遇到问题时，则往往很有参考价值。又如我在对照葛斯德藏本和商务影印本时还发现同为宋刻本但目录排列不同，葛斯德藏本“翔七”为《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密多经》（后题为“端平元年（1234）三月刻”），而商务影印本“翔七”则为《能断金刚波罗密多经》。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当然得进一步加以研究。

在《影印宋碇砂版大藏经序》中说：“碇砂大般若经六百卷，虽毁于宝祐六年（1258）之延圣大火，补于宋咸淳（1265～1274）及元泰定（1323～1328）、至顺（1330～1332）、天历（1328—1330）之妙严寺版”云云！但胡适据葛斯德藏本“天一”叙跋则说：“此跋最可证明碇砂原刻大般若到至顺三年还是完好可供

较雠的，用吴兴妙严寺刻本补续，只是开元卧龙的事。”如果真如胡适所说，又可对影印本若干说法有所纠正。

上面说的这些问题，如果不是自己能进入善本书库去翻阅原书，是很难发现的。因此，我认为应该让一些学者较自由地进入善本书库翻阅藏书，只有直接而且大量地翻阅，就会发现一些新问题，启发出一些研究课题。

据我在国外各大学图书馆所见，有不少书是国内少见或根本没有的，例如大家所熟知的《四书参》和《四书眼》不仅国会图书馆有，哈佛燕京图书馆也有。我还听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戴廉先生说，吴晓龄先生在哈佛大学时曾说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小说中有十一种是国内没有的。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朝鲜金洙根编的《朱子大全劄疑问目标补》一种，据哈佛大学教授杨联升先生告我这是世界上很少见的。我因第二天要离开美国，下午匆匆翻阅了两小时，前面有一“跋”说

“《朱子劄疑》一书，尤庵先生因退溪先生记疑而广之，以嘉惠后学者也。先生之原书之未及详勘，托梳洗之工于我先农岩先祖。先祖遂有《问目》之作及《劄疑》书刊行于世。《问目》概多节入，而就考问目并编去取之际，盖犹有阙疑，此留山翁标后之所以作也。标补共二十四卷”云云。

这部书颇有用处，对了解《朱子大全》的内容很有帮助。

由于目前国外善本书库都是对学者开放的，如果我们去进行一些调查了解，把一些重要的我国流失于国外的古籍影印回来，加以整理出版，这对于我们开展学术研究将是很意义的。

85年1月31日

几点务虚的意见

吴 小 如

整理古籍已提到日程上来，这是大好事。但这一工作毕竟刚刚开始，有许多环节还有待于总结经验，逐步改进，使之日臻完善。有些具体问题留待以后再谈，这里只想略谈几点务虚的意见。

我从五十年代就听到这样的话：整理古籍的工作，“好汉子不干，赖汉子干不了”。这话有一定的代表性。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同志抱这种态度或持这种想法，即整理古籍不如写论文有价值。有的同志虽认为整理古籍需要基本功，却主张只要把这点基本功学会了，就可以了，真正安身立命的事业还是写学术论文。这是属于“好汉子不干”范畴的。另外，就目前参加整理古籍这一工作的同志们来说，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什么校点古书、注释诗文或对古书进行今译等等并不难，虽不说手到擒来，至少是只费功不费力、只繁而不难的。而事实绝非如此。正由于某些同志对这一工作不免掉以轻心，才造成有些新出版的经过校点的古书里面总或多或少出现硬伤的现象，从而社会上对这一工作的意见也层出不穷，专家们信不过这些已经过整理的书，一般读者或舆论界对整理古籍则不予重视或重视不够。这样，对我们的文化事业终归是不利的。

我的意见是，第一，必须迅速提高专业

队伍的水平，在增加人手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提高业务质量的重要性。整理古籍是严肃的科学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和虚假，不能只顾以多为胜，还要把好质量关。在一定的情况下，我倒主张与其仓卒上阵，不如宁缺毋滥之为好。第二，一定要扭转对整理古籍工作重视不够的看法。校点好一部古书，其价值并不下于自己写一本专著。试看，有的同志能写出很好的学术著作，却不一定保证他所校点的古籍不出硬伤。但人们却认为写别字、读讹音或点错了句读乃小事一件，无伤大雅。我则以为，这样的“白圭之玷”是不应该的，至少从自己这方面应该反躬自省，严肃对待，力求不再犯这类错误。同时，在物质报酬上，对整理古籍和撰写论文之间的比例也不宜相去悬殊。特别是有些学术单位的领导同志在评定职称和晋级调资时过于看重一个人的论文而往往忽视他在整理古籍方面的贡献。其实整理古籍是既费功又吃力，既繁又难的工作。第三，老专家带“徒弟”是完全必要的，可是我建议老专家也要亲自动手，不能只挂名不干事。现在有的书每由某位专家带头署名，实际上并未尽到“把关”之责。这对读者固然有不负责之嫌，就是对专家本人也是不利的。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浅谈图书馆的古籍整理工作

姚 伯 岳

古籍整理工作在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编撰《别录》、《七略》，直到清朝乾隆时编修《四库全书》，几乎每个稍为稳定的封建王朝都进行过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工作。而民间私人所从事的古籍整理工作更是从未间断。在长期的古籍整理工作中，版本学、校讎、目录学乃至训诂学、考据学逐渐成熟发展起来，构成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重要特点，表现着中华民族高度的智慧和勤劳耐久的精神。

应该注意到，上述大部分学科，都是在古代的图书馆——藏书楼的摇篮中发展起来的。藏书楼在保存和整理古代典籍的活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固然，由于线装书基本不再增加，线装的古籍在图书馆中的比例越来越小，古籍整理工作已不再是图书馆活动的全部内容。但现在的事实是，几乎每个藏有古籍的图书馆都将古籍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予以保管收藏。作为图书馆的一个局部工作，古籍整理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据估计，我国现存古籍约有十万种左右。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绝大部分都度藏在图书馆。所以古籍整理工作和图书馆密切相关。图书馆是古籍整理的重要基地，同时起着后勤部的作用。有人认为，古籍整理是出版发行部门的工作，图书馆的古籍工作不能称之为古籍整理。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因为古籍整理有两重含义。一是为古籍出版所作的校勘、注释、今译等，名之曰古籍整理；一是图书馆对度藏古籍所作的分类、编目、装修等，亦名之曰古籍整理。两种整理虽有

不同，但都属古籍整理不可缺少的环节，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两个方面。而后一种整理，是为前一种整理创造前提条件。前一种整理要利用后一种整理的成果。注释出版一部古书，必须收集各种不同的版本，比较鉴定其优劣，文字异同，确定底本，进行文字的校讎，然后才是注释、标点、付印出版。而前两者均属图书古籍整理的内容。可见，出版发行部门的古籍整理工作必须以图书馆的古籍整理工作为基础。二者是一种工作的两个阶段。

事实上，图书馆也常常担负起古籍的校勘、注释、甚至辑佚等工作。如近年出版的清李绿园《歧路灯》校注本，就是河南省图书馆栾星同志经过十年努力，收集各种民间抄本和残本共十余种，细加校勘、分段、标点，注释了方言俚语和典章制度。使这部被埋没了二百多年的优秀作品重见天日。又如《析津志》，是一部最早记述北京和北京地区名胜古迹、山川风物、土产矿藏、岁时风尚的极可宝贵的地方专志。可惜此书大约于明代中期失传。而经过北京图书馆善本组同志们的努力，去年又重新辑佚整理出版了。这无疑是对学术界的一大贡献。

目前，图书馆是有一大批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人员，在整个古籍整理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图书馆的古籍整理工作，同时也是一种学术性工作。版本的著录，要掌握和利用版本学的知识，书籍的分类，要利用古代目录学的知识，保管收藏更需要藏书保护学的知识。因此，即使是对馆藏古籍的整理，也是

一件非常严肃和重要的工作。有的图书馆对线装书不重视，长期无人过问，大量书籍尘封土埋，鼠啮虫蠹，日渐残破，许多古籍没有函套，丝线断烂，使数遭厄运的古籍又经历着新的灾难。许多图书馆在古籍的版本著录上存在着大量问题，如人民大学图书馆竟将明本著录为宋泥活字本，闹出笑话。有的图书馆分类失当，书籍放置凌乱。这些问题都说明图书馆古籍整理是一件亟需重视的工作。否则这些珍贵的文化财富将毁坏在我们手中，更谈不上对它们的利用了。

编制书目和索引也是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历代官方藏书和私人藏书都有编制目录的好习惯，成为我国古代藏书史上的一个优良传统。这些丰富的古代藏书目录，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学术面貌，为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尽管所记录的许多图书都已亡失了，却赖这些目录书而在世间留下了或多或少的踪迹，所以唐代的毋斐评价目录书可以使人“不见古人面，而见古人心。”近人余嘉锡先生也说“目录之学，实兼学术之史也”。

编制本馆的古籍藏书目录，是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的一件最严肃也是非常必需的一项任务。它代表一个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的成绩，标志着它的学术水平。由于古籍数目不再增加，藏书比较稳定，一般都可编制书本或目录，甚至还可以出版，以促进社会对古籍的利用和各馆的互通有无。

除编制各馆的古籍目录以外，还应编制社会性的古籍目录。解放后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以上海图书馆编撰的《中国综书综录》和近人孙殿起、雷梦水编撰的《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最为突出。1978年又开始了《全国善本书总目》的大规模的编撰工作。它将代表我国目前古籍整理工作的普遍学术水平，对全社会的古籍整理工作也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所有这些目录书的编制，都需要图书馆的辛勤努力和大力协作。离开了图书馆的古籍整理工作，任何进展都是不可能的。图书馆的古籍整理人员和出版发行部门的古籍整理人员携起手来，共同努力，一定会迎来古籍整理和古籍出版工作的新飞跃。

《楚辞》二题

金 开 诚

一、《离骚》题义补说

“离骚”二字的意思，旧说可以概括为两类：

(一)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离骚赞序》训释更为明确：“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二说略同，多为后人所宗，并有所申说。唐代颜师古说：“离，遭也。忧动曰骚。遭忧而作此辞。”（《汉书·贾谊传》注）清代钱澄之说：“离为遭，骚为扰动。扰者，屈原以忠被谗，志不忘君，心烦意乱，去住不宁，故曰骚也。”（《屈诂》）颜、钱二说皆释“骚”为“动”，虽“忧动”、“扰动”不无差异，但“扰动”而至于“心烦意乱”，则亦转为“忧”意。又清代段玉裁说：“《屈原列传》曰：‘离骚者，犹离忧也’。此‘骚’古音与‘忧’同部得之。‘骚’本不训‘忧’，而扰动则生忧也。故曰‘犹’。”（《说文解字注》）按段说实际是指出了两种可能：一是因为“骚”、“忧”古音同部，所以相通；二是因为“骚”为扰动之意，而扰动则生忧。前者得之于声，后者得之于义，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但结为“忧”意，段无异辞。又清代王念孙于《广雅》：“骚，愁也。”条下说：“《史记·屈原传》：‘离骚者，犹离忧也’。‘骚’与‘骚’亦同义。”（《广雅疏证》）这是读“骚”为“骚”，而训“愁”，“愁”也就是“忧”。至于“离”之训“遭”，则段、王均无异义。以上第一类，虽解释之途径不一，但都肯定“离骚”为“遭忧”之意。

(二)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说：

“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按《离骚》称“经”，当是因为汉人推尊此篇。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皜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离骚序》引）《离骚》既兼《国风》、《小雅》之义，“可与日月争光”，则非“经”而何？又刘安注释《离骚》而名其所著为《离骚传》，也明明是援用“经”、“传”相配之例。王逸在经学盛行的东汉时期，竟释“经”为“径”，并谓“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云云，真不可解，今姑置勿论。但他释“离骚”为“别愁”，则似可通，所以在后世亦很有影响。宋代项安世即据楚方言补证其说：“《楚语》伍举曰：‘德义不行，则迕者骚离，而远者距违。’韦昭注曰：‘骚，愁也。离，畔也。’盖楚人之语，自古如此。屈原《离骚》，必是以离畔为愁而赋之。其后词人仿之，作《畔牢愁》，盖如此矣。畔谓散去，非必叛乱也。”（《项氏家说》）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亦有类似之说。又明代汪瑗说：“篇内曰‘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此《离骚》之所以名也。王逸曰：‘离，别也。骚，愁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其说是矣。”“若谓明己遭忧而作此辞，则二十五篇为遭忧之所作者多矣，而总称之曰‘离骚’可也，又奚必篇各有题名乎？”（《楚辞集解》）又清代戴震说：“离，犹隔也。骚者，动扰有声之谓。盖遭谗放逐，幽忧而有言，故以‘离骚’名篇。”（《屈原赋注》）义虽稍异，但释“离”为“隔”，亦属王说一脉。

在以上两类旧说中，“骚”或作“忧”解，或作“愁”解，实质无别。分歧是在“离”的训释上，或作“遭”解，或作“别”解，不可调和，当于后文辨之。在近人解释中，影响较大的有游国恩先生说。其说略谓《大招》“伏戏驾辩，楚劳商只”，王逸注《驾辩》、《劳商》皆曲名。“离骚”与“劳商”双声通转，可能是一个名词的两种写法。然则《离骚》应是古曲名，用为篇目正与《九歌》、《九辩》相若。至于“离骚”二字本身的意义，游先生认为，扬雄曾根据《离骚》作《反离骚》，又模仿《惜诵》至《怀沙》各篇而作《畔牢愁》；“畔”与“叛”通，也是“反”的意思；“牢愁”即“牢骚”，所以《畔牢愁》实际就是《反离骚》。“离骚”与“牢愁”、“牢骚”在声音上也并以双声，叠韵通转。所以“离骚”二字当视为一词，不宜分释。（说详《楚辞概论》）此说颇为有据，所以郭沫若先生亦深表同意。（见《屈原研究》）

又钱锺书先生说，“离骚”的意思，类似用作人名的“弃疾”、“去病”，或用作诗题的“遣愁”、“送穷”。因为“离”是“分阔”的意思，所以“离骚”是“欲摆脱忧愁而遁避之”，是“与‘愁’告别”，而非“因‘别’生‘愁’”。（说详《管锥编》第二册）此说巧妙可通，很有参考价值。

按屈原辞作之篇名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概括全书之意而命名，如《天问》、《涉江》、《哀郢》、《怀沙》、《招魂》等。其二是以篇首二字或三字、或篇中二字作为篇名，如《惜诵》、《抽思》、《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等。其三是以楚之古曲名为题，如《九歌》（《九辩》亦属此类，但非屈原所作）。在以上三类中，《九歌》是一套祀歌，并非屈原始制，只是作了加工，当然要保持原来作为巫用“仪式歌”的定名；所以《九歌》虽与屈原有关，但其命名别有渊源，不可视为概例。另外，《涉江》也是楚曲之名，但屈辞中的《涉江》乃是因为“旦余济乎江湖”之意得名，全篇主要内容亦是写“济乎江湖”及其后的经历；题为《涉

江》不过是与楚曲偶合。因此在屈原所创诸辞中，以曲名为篇目者尚无旁证，目前还需存疑。

就另外两种命名类型而言，有一个现象很可以注意。司马迁在《屈原列传》赞语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另外传文中说到“乃作《怀沙》之赋”，并录其全文。（又传中亦录今本《渔父》之文，但主要是作为记事成分，未著题目。）然则《屈原传》所著录的屈辞，除《离骚》一篇正待论证外，其它各篇的题目均可确定属于上述第一种类型，即概括全篇的意义而命名。

根据这一现象又可以发现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屈原辞中凡属于上述第二类型的篇名（如《惜诵》等）都编在《九章》之中。王逸《楚辞章句·九章序》说：“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似乎《九章》之名为屈原所定，而且是有用意的。但这一说法绝不可信，因为《九章》各篇并非都作于“江南之野”，如《桔颂》作于早期，《抽思》作于汉北，皆至为明显。可见王逸并不确切了解《九章》各篇的写作背景；因此所谓“章者，著也、明也”云云，也只能是出于望文生义。宋代朱熹说：“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楚辞集注》）其说虽亦不尽确，但指出《九章》为后人所辑，因共得九章（篇）而标为卷名，则近乎事理而大致不悖《九章》各篇的实际，所以较为可信。《九章》之名最早见于刘向《九叹·忧苦》：“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因此也有可能就是刘向典校经书时把它们辑在一起并标为《九章》的。不论是刘向或是更早的人，当其辑《九章》而为一卷时，必是因为看到《惜诵》、《抽思》、《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五篇都无篇题，所以才取篇首或篇中二三字以为之名；反之，《涉江》、《哀郢》、《怀沙》、